

# 实践感与实践智慧\*

——《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评介

袁超乘

如何研究？怎样训练？这可能是有志于党史研究的新学或后进最想了解的问题。至于答案，除了自我探索，恐怕还得从有关党史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或前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中获得。但实际情况是，通常的方法论类作品更多生产启发性的实践观念，其在逻辑上也许是完备的，但涉及到指示具体实践时则力所不逮；前辈学人的治学经验可能具体而充满洞见，但其应用似乎也存在一定“门槛”，少有学科化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说明。这两方面的不足反映了一个有待填补的罅漏。

近读周良书教授新著《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sup>①</sup>（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颇觉是对此罅漏的有效补苴。该著关注全过程的党史研究，从“文本阅读”“学术训练”“研究选题”“史料运用”“立论方式”五个方面，以区别于一般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的方式，对如何进行党史研究和怎样实施学术训练的实践问题作出系统全面、细致切实的说明。正如书中“自序”所言：“本书主要讲述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方法论，虽也探讨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更多关注的是由理论到实践的环节”<sup>②</sup>。总体来说，《党史书谈》一书通俗易懂又深具启迪，呈现了与通常纯理论的高头讲章不同的——充满“实践感”，体现“实践智慧”<sup>③</sup>的状态，具有独特的价值。对此，可以分三个部分进行评介。

## 一、语境到认知：实践化表达的构造

通俗易懂又深具启迪，是《党史书谈》一书给人的最直观感受。这种感受源于书中围绕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展开的实践化表达。它的存在，表现为语言表达上的充满“实践感”，同时更是创作过程中“实践智慧”式思维的体现。通过对书中实践化表达的分析，其独特价值便能够获得整体性说明。

一般而言，对方法论的讨论以解决特定问题为导向，重在说明“怎么办”。《党史书谈》所要解决和说明的便是怎么进行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问题。而要清晰地说明“怎么办”，使其核心意义被有效表达和准确理解，有赖于协助意义生产的特定“语境”，即通常所说的“上下文”。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的发生、演进与机理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21YJC710084）的阶段成果。

① 为便于说明，以下皆以“《党史书谈》”简称。

②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③ 所谓“实践智慧”，最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明确论述，指人类认识事物和表述真理的一种知识形态。与此相对的是“理论智慧”。“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最大的区别，在于所遵循的不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不追求“永恒的东西”及其“终极存在”。它以“更好地实践”为目的，追求一种“善”，关注的是特殊和可变的事物。但“实践智慧”又与“技艺”不同，它不是单纯的一般对具体的应用，而是在具备一般性（理论）的把握的前提下，操持一种批判反思的审慎态度和根据特殊性而预备修正的意识，最终是使实践过程获得更好发展。所以说，“实践智慧”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党史书谈》中的“语境”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依靠其生产的意义具有明确的实践化特征，能够给予实践以更加具体和切实的导向。这在以下例子中可以得到说明。

书的“怎样阅读”一章有论“阅读之法”，谈及“用脑读书”。怎么“用脑”呢？这里提出“钩玄提要”“细心揣摩”与“学而时习”三条目。就“钩玄提要”而言，论者强调要“关注序例”和“抓住书眼”。之所以要关注“序例”，是因为序言讲明了写书的纲领、目的，凡例能提示需注意的地方，“后记”则交代写作经过及提出启发性问题，并且序例还往往藏着正文看不到的真知灼见（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中提出的党史书写原则）。它们成为把握全书要旨和获取作者思想精华的关键<sup>①</sup>。至于“抓住书眼”，书中认为其要领是读好“大字”（即目录），明晰纲要；会看“小字”，掌握信息。这两个环节有助于快速进入书的中心，构成“钩玄提要”——“用脑读书”的实践着力点。

仔细分析以上语言表达的构造可以看到，从“怎样读书”到“用脑读书”，再到“钩玄提要”及其下设的“关注序例”和“抓住书眼”的具体论述，依托这种论题层层套嵌的形式，次级论题的意义不断上升，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结构。同时，论题的逻辑秩序及其具体论述表达，编织起理解意义的“语境”。这里的“语境”充满了实际阅读实践过程的要素和细节，因此，其生产的意义也就传递出明确且具体的实践导向。质言之，就是读者能够跃出一般的道理认识，更进一步了解到关于“读书”实践的具体方向和着力点，从而获得了一种富有“实践感”的阅读体验。

这种实践化的语境构建，遍布于《党史书谈》全书的论述之中，使得关于如何进行党史研究和怎样实施学术训练的说明充满“实践感”，形成了整体的实践化语言表达。此即书中所说的：“让读者看到更多田间地头的劳作，看到更多实际行动的过程”<sup>②</sup>。不过，实践化的表达特点并非只是作者在形式上的有意构造，而是基于创作过程认知状态的自然流露。

周良书在“后记”中特别解释了“萌生写这部书最初的念头”，将此归为深感于张静如先生提出的建立中介理论体系的主张及其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说明唯物史观如何在党史研究中应用的尝试，开始思考沿着这一思路，“在应用层面再延伸一步，探讨一下党史教学与学术训练的问题，以使这个学理问题变得更可操作”<sup>③</sup>。可以说，“更可操作”的旨趣为《党史书谈》的创作定下了基调，而在细致的认知过程中，则体现为“实践智慧”的独特思维方式。

通常情况下，要讨论解决某学术问题的方法，理论化的认知取向处于优先位置，其重点是通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来分析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般性的方案。这种方案是理想的，并不以说明实际情况下的具体实践如何开展为根本，更多的是给出原则性和启示性的解答。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认知取向还可以是经验化的，即从实践出发，根据丰富的经验找到某些相类的情况，进而识别出特定的方法。就这两方面而言，自有其价值和优势。但在极端情况下，前者有可能流于空泛的理论说明，不能切实满足解决问题的要求；后者则在系统化、严密性和普适性上存在短板。由此反观《党史书谈》的认知取向，其以“更可操作”为目标，意味着将说明实际和具体的实践作为根本。但这里并非只是单向择取特定经验构成实践的范例，而是实施理性思辨与经验总结的相向而动，互为作用，使得实践的具体性与一定限度的一般性相融合。所以，最终的结果就体现为既充满“实践感”，又具有理论把握的状态。对此，书中“逻辑思辨”一节可作一例。

①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4页。

②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49页。

③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305页。

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材料信息,需要研究者通过逻辑思维来完成处理。因此,“逻辑思辨”成为研究者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对于逻辑思维训练的问题,《党史书谈》给出了独特的实践化解释——书中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讨论“逻辑思辨”的内在哲学原理,而是围绕分析、综合、演绎、归纳四种一般性的逻辑思维类型,说明其被“运用”的状态。因此就有了“用分析法认识细节”“用综合法把握整体”“用演绎法从一般到个别”“用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这些论题。在具体论述中,这些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状态获得细节和要点的展现,进一步明晰它们的一般性以及运用中的特殊性。这便是理性思辨与经验总结相向而动的结果。

实际上,《党史书谈》中论题的凝练、编排以及具体论述,都能看到理性思辨与经验总结相向而动的认知状态。更进一步讲,这种以更好地实践为目的,并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般性探讨的认知取向,所体现的便是实践哲学中所强调的“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实践智慧”式的思维方式及其认知状态,形成了充满“实践感”的说明,二者共同构造起本书极具特点的实践化表达。这种表达相较于更多以理论化(或哲学)方式展开的方法论说明,显得尤其独特;而对于希望获得研究和训练的具体实践提示的读者而言,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 二、具体化的“实践智慧”

充满“实践感”,体现“实践智慧”的实践化表达,是《党史书谈》的突出特点。就具体内容来说,书中涉及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方方面面,可谓细节丰富。这其中包含了众多对于研究和训练实践有重要导引与提示价值的论述。它们是“实践智慧”的具体化体现,在此就其中典型和重要者作简单介绍和说明。

第一,关于“怎样阅读”的解说。

就广义的党史研究实践而言,“阅读”是其中重要一环。但该环节属于“日常功夫”,往往是因人而异,极具“个性”的生成性存在,很难进行系统分析、严密推导和完整证明。所以,通常的党史学或史学理论作品较少有此问题的专门讨论。尽管如此,《党史书谈》基于研究实践的全过程认识,把“阅读”从“幕后”拉到“台前”,专辟“怎样阅读”一章进行条理化的说明。但这里的条理化说明,并不是源自理论上某种预设的逻辑推理,而是基于实践视野的深入思考。

书中首先谈到的是“阅读”的三种基础性作用:积累史学、锻炼史才和增长史识,并更进一步将三者细化为获取知识和资料、模仿技术以及提升观察力。由此就可以看到一种以“作用”为根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这种作用的说明还属于宏观认识,给出的乃是方向性导引的话,那么在后续“规划读书”和“阅读之法”两节的论述中,便显现出更多具体可操作的内容。其中对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都作了切实的细节展现和要点说明,如细致介绍阅读党史研究文章的途径(杂志和名家),提点批注、摘录、札记等读书方法运用的关键。这些阅读的“技艺”构成了实践的直接提示。除这些关于阅读实践的导引和提示外,书中还特别论及读书人修养的塑造,这是作者最为深层的实践体悟。不过,相较于外在技艺的具体与易得,内化的修养则显得抽象而难成,研究者非有一定经验不能完全理解。虽则如此,若能照此解说执行,研究者必可少走不少弯路,其学亦会日益精进,逐渐成为真正的读书人。

第二,对于“历史想象”的实践式解释。

历史想象是史学研究实践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这在史学理论界早已是共识。正因如此,历史哲学家们发出本体论的追问,试图穷尽思考,接近其“终极存在”,从而对“历史想象”的本质作出精确的定义,揭示其哲学原理。于是就有了“心灵想象”说、“移情体验”说、“境况分



析”说等解释，但始终难有定论。不过，在现实中，“历史想象”往往是一个实践问题。

关于历史想象的实践，“带着镣铐跳舞”应该说是对其状态的贴切比喻。许多研究者从“镣铐”的角度出发，尝试为历史想象的运用确定原则、范围和限度。与此不同的是，《党史书谈》虽同样将视线聚焦于历史想象的实践，但其说明并不满足于“镣铐”的讨论，而是直接论述“跳舞”本身。在这里，把握历史现象背后的思想被视作历史想象的目标，因为历史现象背后“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为此，书中给出了一个具体实践案例：理解我国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背后的思想脉络。在这一案例中，作者将苏俄党团制度、国共合作中共在非党组织中设立的党团制度、“三湾改编”、延安时期高校执行的党组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7种高校领导制度联系起来，在制度变迁中抓住一以贯之的思想。如此实际的论述，加之在一般性层面对历史想象3种构造性作用（将事实连缀为历时性的过程、网结为共时性的整体、转化为“历史事实”）的说明，就为“历史想象”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实践式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无法涵盖有关“历史想象”的所有内容，但它的确合理和有效地说明了历史想象的存在，能够给读者以切实的导引，其价值亦由此凸显出来。

第三，针对“以史带论”实践逻辑的说明。

关于“史”与“论”的关系，史学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存在争论和分歧。对此，《党史书谈》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史为根本，论出于史，论源于史并验证于史。再详言之，理论“只是史家用以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一切理论都应服务于历史叙事，切不可让史实迁就于理论，更不能将理论当作历史分析的证据”<sup>①</sup>。这种认识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与此同时，书中更进一步回答了在研究实践中如何处理“史论关系”的问题，其对于“以论带史”实践逻辑的说明尤其值得注意。

按照书中的说明，“以论带史”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实际研究过程中处理观点与史料、理论与历史之关系的认知状态的描述。其核心在于将“论”视为一种可修改变动的导引性提示，而不是当作固化的预设性前提；而“史”则是自足的存在，而非“论”的附庸。换言之，在实际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先有研究的意向和假定，但不能预设研究的前提和立场，不能依据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有选择地剪裁史料，为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而对复杂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sup>②</sup>在这里，“史”仍是根本，而“论”亦能充分作用，“论”与“史”之间呈现为“带”而非“代”的状态，“以论带史”和“以论代史”的区别由此被揭橥。再从整体上来说，这种研究认识过程及其结果与“论从史出”的原则并不相悖，只是“以论带史”强调的是研究实践的实际操作，“论从史出”则是在理论层面的总括性把握。所以，书中关于“以论带史”的说明，是对其在实际研究中的实践逻辑的展现，而这也正是处理“史论关系”的“实践智慧”。

除这3点外，书中还包含着众多对于研究和训练有重要价值的导引和提示，构成“实践智慧”的具体化表现。从读者角度来说，这些具体化的“实践智慧”有益于其更好地开展实践，令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更加有效。

### 三、另外的“视点”与“景观”

讨论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方法论，是《党史书谈》的主要创作意图。虽则如此，作为一个

①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232页。

②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242页。

文本,读者还可以从不同的“视点”来对其内容进行观察,进而获得另外的“景观”。这些“景观”不论是作者的经意构建,还是无意表现,都有利于拓展认识,发现另外的价值。在此试举3例进行说明。

第一,展示党史学科的生态。

在《党史书谈》的表达中,以实际研究实践过程的要素和细节,营造了具有切实实践导向的语境。其中涉及到丰富的与党史学科相关的内容,凸显着实践导向本身的学科属性。如果从党史学科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到现实中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换言之,这些内容构成了对党史学科生态的展示。

这里关于党史学科生态的展示,既表现为对“史料”这类基础性构件的详细梳理和典型列举,同时也显示为对其中的行为主体,即“研究者”的介绍。书中虽不对党史学人群体做专门讨论,但却援引了众多党史大家的治学经历以实施论题的说明。在这些案例中,能够看到党史研究领域的引领者们如何读书、选题、思考、表达。同时,在他们治学经历中所体现的关于党史研究的理念、方法、原则、价值取向等内容,往往具有代表性或者典范意义,对党史研究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引领、规范和形塑作用。比如,在引述张静如先生的治学经历中可以看到:作为党史大家,他不仅在治学上有着开创性贡献和巨大影响,同时也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推动党史学科进步。其对于党史研究的思考,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弟子的传承实践,深刻影响着党史学科的发展。如此,党史学科生态内里的抽象构件便在党史大家的治学经历中获得鲜活的展现,同时学科生态的历史形成亦在其中被反映出来。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种要素外,书中对党史研究领域特有细节的说明,也展示了党史学科生态。比如书中对党史研究“富矿区”的总结,点明了该领域中讨论度高、内涵空间丰富的对象,表现出对学科发展状态的细致把握。同时,书中还展现了不少平时难见于书面的细节,如谈到期刊论文的发表,说明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几种专业学术期刊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提及“会议文章”,特别点出了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会议;针对“纪念文章”的撰写,按年份清晰罗列主题。这些细节说明虽显得“土气”,但却是对党史学科存在更具“原生态”意味的展示。

这些内容是全书“实践感”中党史味道的来源,它们展示了党史学科的生态,构成了另外的“景观”。从学科生态角度重新认识这些内容,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快进入开展研究的实践场域,融入学术共同体。

第二,体现传统、现代、后现代治史理念的兼容并包。

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指示了三种关联性的思想状态。它们之间常常显示为冲突、批判和解构,如后现代激烈质疑现代的进步、理性、普遍性、元话语等追求。不过,延伸到实际的学术实践上,三者却往往能够共存。其中的冲突、批判和解构的效应也转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为研究拓展视野、更新认知和转换范式提供启示,促进学术的发展。

以上情况在包括党史学在内的史学研究中同样如此。对于实践的史家而言,实际状况下,重要的不是区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而是它们提示的治史理念或方法是否对研究实践的开展有所裨益。换言之,在现实的史学研究中,基于实践的立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治史理念能够兼容并包。《党史书谈》中体现的正是这种状态——其中有对众多中国传统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的引用和阐发,如论及“史者三长”“义理”与“读书得间”;也有对现代史学所持“客观”“求真”“实证”之信条的强调和恪守;还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接纳。书中对“单线史”与“复线史”、“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讨论,就具体反映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兼容共进的实践理念。不难看出,这种理念以更好地推进研究为依归,体现了“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对于党史研究者

而言是可资借鉴的。

第三，反映一位党史学人的为学之道。

作为一个文本，《党史书谈》的内容生产面向的是读者，但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自我”的表达。基于这一“视点”来观察文本内容，就可以了解作者的为学之道。亦如“自序”中说的：“人家看后可以大概了解作者何许人也，知道这个人如何读书、怎样走路”<sup>①</sup>。

叙述个人的研究经历，是书中“自我”表达的直接体现。作者治党史以高校党建史见长，为该方向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正是依托研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感而生思”带来的深入认识，在《党史书谈》中常能够看到其结合自身学思历程来对特定问题进行说明的案例，如讨论选题问题时，述及为何选择高校党建史作为研究方向、怎么开掘大学校史研究的新意义、如何以“党”的观念转变进行破题等。这些案例的说明，勾画了作者在推进高校党建史研究的轨迹及状态，展现了一些未在最终成果中表达的认识和思考过程，使得读者能够了解成果形成背后的“所以然”。在这些具体的治学经历之上，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党史书谈》对于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问题的说明，其实也正是作者思考为学之道的“自我”表达，而他的治学方法、原则、理念亦在其中得到反映。

以上所述体现了作者治学的理性成分，在《党史书谈》中还可以看到其为学的情感因素。如书中讲述了探索和突破中共初生于高校却没能在早期解决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党这一问题的经历，在最后特别提到“因此欢喜过好一阵子”<sup>②</sup>。见微知著，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于党史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兴趣可以说是治学研究一种持续不竭的动力，所以他在书中特别强调有兴趣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才能使党史研究者达到“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状态，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另外，周良书在书中表达了对于恩师张静如先生的无限崇敬和怀念。继承和发扬张先生的治学精神，延续并拓展张先生的研究事业便成为了其为学的另一重情感因素。这些情感动力与理性的治学认识一起，反映了作者的为学之道。对于党史新学而言，可以将这位党史学人为学的经历与思考，作为学术之路上的对照和提示，帮助其发现自己的为学之道。

总的说来，《党史书谈》秉持“更可操作”的旨趣，基于“实践智慧”式思维，以充满“实践感”的方式说明了如何进行党史研究和实施学术训练的问题。这种说明为党史研究和学术训练的实践提供了系统、切实和具体的导引，是对一般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的重要补充，因此具有了非常独特的价值。尽管还有更深入讨论的空间，但读者已经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的提示，在认识上更加清楚于实践层面如何推进研究和训练。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书面的实践化说明永远无法满足现实实践的复杂要求，读者在获得导引和提示后，真正需要的便是进入到实践场域之中，以实际的实践来推进研究和训练。

（本文作者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 100083）

[责任编辑：王昌]

①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4页。

② 周良书：《党史书谈：阅读和写作的技艺》，第141页。